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6

2009年2月1日

金融危機與亞洲的“文化革命”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特約研究員 黃曉京

美國的金融危機，“全球化”了。其發生過程與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機極為相似，但內涵不同，規模和惡果則遠甚之。當年，美國對日本的危機處理指手劃腳，這次成了被告，罪名是過度金融，透支信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已經擴散到實體經濟，美國可能和日本當年一樣走入經濟衰退期，“失去十年”，並把世界捲入其中，嚴重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關於金融危機的本質到底是什麼，目前存在不少爭論。問題的焦點是，金融危機只是“過度金融”，“監管不力”而已，還是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體制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將決定我們的應對和戰略選擇。

對美國和日本的金融危機作個比較分析，或許有助於理解這次危機的本質。美日兩國，雖然是“軍事同盟國”，卻有著兩種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體制。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核心是美國式金融模式，追求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日本式資本主義，因為是“後發國

家”，國家戰略指導並介入市場，金融市場相對封閉，追求社會整體的利益平等，顯示出“人本資本主義”的特點，因為以公司團體為社會中心，也被叫做“日本株式會社”，或“法人資本主義”。1980年代，以“管理的市場經濟”（Governing Market）為基本特點的“日本模式”，“東亞模式”，一度達到了頂峰，受到全球追捧。冷戰解體之後，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則大行其道，對於所謂“轉型國家”來說，幾乎成了唯一美好的“彼岸”。“歷史終結論”登場、宣佈西方的，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將是唯一的歷史選擇，社會主義是個“笑話”，一度成功的“日本模式”就更不值一提。

從這個邏輯出發，人們往往將日本的“泡沫經濟”與長期衰退，歸結於過度的政府干預。1990年代中後期，日本金融危機爆發，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之下，日本開始與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接軌”的改革。激進的小泉內閣，號稱“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大力實施美國式“構造改革”，將傳統的郵政三事業“民營化”，實行金融自由化，並解除各種政府“規制”。以後，繼任的安倍，福田，麻生三屆內閣，似乎還在消化和反思“小泉改革”的後果。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投機賭博”氾濫成災，從次級貸款創新始，以“雷曼休克”終。格林斯潘承認，自由市場主義“犯了一個錯誤”，斯蒂格利茨則將美國金融制度的垮臺與“柏林牆倒塌”相比，批評了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喬姆斯基則說，市場原教旨主義是一場災難，金融自由化導致災難。

關鍵的問題可能還是老問題，國家與市場的關係。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式金融模式，排除了政府監管，資本的貪婪本性，加上解除監管的制度設計，政府和市場“雙重失敗”，也就是制度危機。日本這個美國的“老二”，追隨美國，創造過經濟奇蹟和“日本模式”，但是由於無法堅守，被迫改革“接軌”，從而陷入長期的經濟衰退，至今還沒有走出困境。有評論說，“當前，在全球經濟、全球環境、全球穩定迫切需要新的變

革動力的歷史關頭，美國卻扮演著一個‘反面教材’（Retrograde）的角色。無論從戰略上還是道義上，今天的美國不但沒有給世界提供榜樣，恰恰相反，布什政府的所作所為使得它的競爭對手——中國、俄羅斯越來越有理由充分地認識到，必須走他們自己的道路，因為所謂民主和人權對於國家的穩定和繁榮的未來絲毫沒有幫助。甚至連來自伊朗的穆罕默德·阿曼達·內賈德，竟然也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利用我們所陷入的困境嘲笑我們，並公開宣告美國時代的終結”。¹

“美國時代的終結”，有待時間的檢驗。至少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資本、股市，樓市，錢市，追漲殺跌的規律，投機賭博的制度，騙子橫行的貪婪，將這一切歸結為“缺乏監管”，難以服眾。況且，美國還要把這種最優越，最精緻的體制，“武裝的民主主義”，和它的價值觀“全球化”，叫世界隨著華爾街，隨著美國利益，隨著美國的“軍產複合體制”沉浮。當全球化變成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無法改變世界，最多是“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加速從過度依賴出口，向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的內需經濟轉變，並且找到刺激內需的治本之策。日本依舊是一面鏡子，在經歷1990年代危機和與美國“接軌”的改革之後，日本正在從困境中找出路，將經營資源大舉向亞洲轉移，提出了“親美入亞”的口號，預示著這個亞洲唯一的“西方國家”戰略轉變。以“脫亞入歐”的歷史觀察，這是日本的“文化革命”，而中國和亞洲，何嘗不需要一場全新意義上的“文化革命”？

一、金融危機的“既視感”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金融危機有一種所謂“既視感”，² 說

¹ 《紐約客》雜誌社論，2008年10月13日。

² 日本學者熊谷亮丸的造詞，〈日美金融危機的既視感〉，2008年10月10日（<http://www.dir.co.jp/souken/research/report/economic/monthly/08101001monthly.html>）。

白了就是“見過”，“似曾相識燕歸來”。衆所周知，1985年《廣場協議》，美國逼迫日本，減少政府干預，通過金融自由化，主動讓日圓升值。當時，中曾根內閣為減少與美國的貿易摩擦，提出“國際協調發展”和“國際貢獻”的政策，開放國內市場，變出口主導為內需主導，緩和各種政府“規制”，結果是國門大開，市場開放，外資長驅直入，日本股市匯市，開始動盪不安，日圓從1985年的1美元比240日圓，升值到1988年1美元比120日圓，內需刺激政策，引發國內股市和房市泡沫。1990年，東京一地的地價，竟然超過了美國全國土地價格的總和，還不斷在電視上大肆炒作！一時間，東京街頭，紙醉金迷，歌舞盛世。美國為代表的國際財團，進入日本炒作賺錢，然後撤出資金，日本經濟從此風雲變幻，泡沫解體，房市股市暴跌，政治動盪。為減少貿易不均衡，美國繼續要求日圓升值，1995年4月1美元兌79日圓，創歷史最高紀錄，出口導向的日本走入死胡同，留下的是十數年的經濟衰退。十幾年之後，金融自由化的始作俑者美國，自作自受，也把世界捲入其中。“儘管次級債危機和日本1989年的資產價格泡沫破裂之間的差異是鉅大的，他們之間的相似性也是驚人的。日本和美國的泡沫都是產自於一段時期的金融試驗行為以及過於寬鬆的信貸氛圍。在美國可以看到，隨著聯儲提供了大量廉價貨幣，抵押資產證券化以及結構性投資產品大幅增長。類似的，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面臨著美國要求其放寬市場的壓力。這掀起了一陣“金融工程”的浪潮，並且導致了新金融產品如金融衍生品的爆發性增長。這一場盛宴在美國要求日圓升值的壓力下愈加火爆：由於貨幣的升值，日本央行降低了利率，導致經濟中充斥了廉價資金。³

日本的刺激內需，首先也是從房地產做起。與美國，歐洲相比，日本人的住宅俗稱“鴿子籠”，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積很小，即

³〈日本金融危機：前車之鑒，後世之師〉，《經濟學人》2007年12月19日(<http://ecocn.blogbus.com/logs/12306204.html>)。

使如此，My Home 還是“中產白領”的夢想。隨著銀根放鬆，貸款利率降低，房市興旺，3~4 千萬日圓的住宅，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猛漲到上億日圓，相當於“中產白領”平均 20~25 年的收入。房市泡沫轉瞬消失，留下的是鉅額壞債，資產貶值。1996 年 5 月，日本“住宅專門公社”（住專），由於住宅投資積累壞債，經營破產，政府排除輿論批判，在國會通過促進“住專”債權的“特別措置法”，動用財政資金 90 億美元救援，並建立“住宅金融債權管理機構”，負責處理房貸問題。“日本挑戰美國”的 1980 年代過去了，美國卻開始了它的繁榮。2001 年布什總統上臺，經濟政策是降低利息，刺激消費，使美國低收入，無收入家庭人人有房住，貸款買房，負債消費。次級貸款，金融工具創新，為轉移風險提供了可能，次貸發放額不斷擴大，數額也越來越大，泡沫由此而生。格林斯潘鼓勵消費，超低利率，房貸可以償還，還可以依舊換新，從利差獲利，美國經濟熱氣騰騰。2004 年，美聯儲連續 17 次上調利率，從 1% 緩慢昇到 5.25%，購房者別說賺錢，貸款首先無法償還，“住宅牛市”走向了終結。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深陷危機，一年損失超過 140 億美元，2008 年 9 月 7 日美國政府宣佈注資二千億美元，接管這兩大機構。保爾森說“兩房”問題，給金融市場帶來系統性風險，政府接管是保護市場和納稅人的“最佳手段”。“兩房”按揭債券（MBS）逾五萬億美元，和日本的 GDP 相當，如果壞債佔 20%，就是 1.4 萬億美元，規模龐大。

當年日本樓市崩盤之火，很快燒到證券公司和銀行。四大證券公司，即野村，大和，山一，日興（現在只剩下“野村”和“大和”兩家），在股市房市泡沫時代極為興盛，是一流大學畢業生最嚮往的公司，大約和中國大學生嚮往就職高盛一樣。1997 年，排名第四的山一證券（1897 年創業），虧損 1645 億日圓（現值 16 億美元），信用下跌，到處求救，其主力銀行“富士銀行”拒絕融資，山一證券求救無門，1998 年宣佈“自主廢業”。山一證券的 CEO，在電視上痛

哭流涕，鞠躬謝罪，哭訴“員工都是好人，一切都是經營者的責任”，此後，不少山一證券的優秀員工被美林證券接收。十年之後，美國發生了幾乎同樣的事件。這次是雷曼。2008年9月15日，恰巧美國四大投行排行第四的雷曼兄弟（1850年創立）公司，由於次貸造成78億美元鉅額損失，四天之內股票下跌80%，總負債高達6130億美元。和山一證券一樣，雷曼也是求救無門。政府不再動用聯邦基金救助，金融界用的是叢林法則，看著這個百年老店破產。雷曼的CEO福爾德在國會作證，說他的每個經營判斷都是“謹慎的，合理的”，也就是說沒有什麼錯誤，更沒有鞠躬謝罪，雷曼員工憤怒不已，聽說他在健身房被人迎頭痛擊，狼狽不堪，還得面對數不清的起訴。正是福爾德式的個體的“合理”行為，一旦成了全體行動，就成了一種愚蠢的自殺行為。日本銀行界人士說，看雷曼事件就像“看（山一證券）錄像”，將美國金融危機稱為“雷曼休克”。至於為什麼不救雷曼，保爾森的解釋是，當時七千億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尚未出臺，因此，財政部和美聯儲沒有能力（Power）和足夠的授權（Authority）去援助雷曼，財政部也希望金融業能夠伸出援手去填補雷曼的窟窿，但最終沒有買家願意收購雷曼。

對於美國國際集團（AIG）這個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保爾森沒有置之不理。2008年2月AIG已經因為次貸損失了111億美元，4~9月連續赤字，信用等級下降，股票跌了74%，最終由美國政府注資850億接管。保險業利潤不高，AIG這幾年大力從事住宅貸款的擔保和證券化的擔保，特別是CDS的交易，總額高達四千億美元，相當於其自有資本的五倍。當年，眾多的日本保險公司也是“參入”住宅擔保，最終導致經營惡化，“朝日生命保險”被“東京海上保險”收購，“大成火災”破產倒閉，而且保險業的健全化，至今還是一個問題。日本的養老保險，生命保險公司，當年大多參與了股市，樓市投資，壞債纍纍，在十餘年後依然沒有完全復興，養老金危機威脅著老齡化的社會安全。

美國危機帶來壞債規模到底有多大？現在還不清楚。有內部估算認為全球壞債大約十萬億美元，金融商品下跌損失 40 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一年的 GDP。2007 年美國 GDP 也不過 14 萬億美元（13.8 萬億），第二位的日本為 4.8 萬億，壞賬就可能超過日本 GDP 的二倍，也是當年日本二百萬億日圓（約二萬億美元）壞賬的五倍。壞債處理，引發了銀行界的重新組合，也和日本當年類似。1998 年，日本金融界“重新整合”，12 家都市銀行，通過剝離不良資產，並購與合併，最後只剩下三家大銀行，三菱 UFJ 銀行，三井住友銀行，和瑞穗銀行。2008 年 9 月，全球銀行界進入亂世，“城頭變換大王旗”。美國銀行五百億收購了美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變形為銀行控股公司，花旗試圖收購美聯銀行的銀行業務，沒有成功，現在要裁員五萬人，美聯最終被富國銀行 151 億美元收購。日本也參加了這次重組，三菱 UFJ 以 91 億購入摩根士丹利 21% 的股權，野村證券買下雷曼在亞太地區的業務。

日本處理大約二萬億美元的不良債權，花了十幾年時間，美國的危機呢？“百年一遇”，遷延時間，無法論定。可以參考的是 1929 年華爾街的歷史性崩盤，和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或者是日本的“失去十年”。1990 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機，倒閉的多是證券，銀行，還有一部分深陷股市樓市之中的“綜合商社”，影響了頗具實力的日本製造業，在十餘年的經濟衰退之中，失業率達到 6%。美國的金融危機，已經逐漸波及實體經濟，波及製造業，估計 2009 年的失業率要超過 8% 以上。美國製造業的代表性企業，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公司（Big 3）佔了美國 GDP 的 4%，直接僱用一百萬人，間接大約 250 萬，如今陷入資金鏈斷裂的境地，通用缺 110~140 億美元，福特缺一百億美元，需要公共資金救援。美國國會熱烈討論，有的說“不能拿稅金補助經營失敗”，有的說拿 250 億救助“環保車”說的過去。歐盟一面說政府介入違反自由貿易原則，要調查甚至去 WTO 起訴，一面也不能不顧及就業，在歐

洲通用有雇員 5.7 萬人，福特有雇員 6.8 萬人，相關產業的勞動人口不是小數，假如底特律也成了華爾街，現實政治的代價鉅大。

最近的 G 20 峰會，布什總統還在唱美國式自由市場主義的老調，相信他的人估計不多。保爾森據說用兩頁紙的草稿，就說服了國會的政治家們，制訂七千億美元的救援計劃。不少人說他搞“國有化運動”，“背叛美國歷史”，“背叛自由市場主義”，言過其實。保爾森 2006 年才離開高盛，不折不扣的金融“內部人士”，對於金融危機的機理一清二楚。1998 年，同樣出身高盛的前財長魯賓，也曾游說國會，通過了“金融現代化法案”，那個法案實際上解除了金融監管。魯賓的“自由化”，保爾森的“政府救援”，符合美國利益，也符合“美國軍產金融複合體制”的歷史邏輯，不必大驚小怪。問題在於，金融危機不是納稅人的責任，拿高薪的高管們一切合理，振振有詞，拿起皮包走人，小投資者血本無歸，納稅人則要為大投機家的“惡業”買單，這也符合美國的“自由平等”的“立國精神”？

二、危機的“日本經驗”

製造業資本主義的日本，戰後的高速成長和 1990 年代的走入衰退，其根源其實也是美國。實用主義的日本，歷來有追隨強者的傳統，過去是中國，近代是西方，在形式上往往是“無條件投降”。明治維新以後，以歐洲為師，富國強兵，戰後以美國為老大，富國不強兵，無力挑戰世界主流。冷戰時代，日本獲得美國的全面支持，以製造業和出口貿易立國，甘當美國的“老二”。有這樣的國家戰略，除了日本的銀行在美國金融危機中賠錢之外，代表日本製造業的豐田，本田，索尼，松下等受到重創，也是題內應有之義，“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日本是後發工業化國家，一部趕超的歷史，可總好像趕不上時代的變化步伐。21 世紀的第六年，全球實體經濟平均增長率為 3.5%，

世界貿易（物流經濟）年增長率為7%，世界股票市場市價總額年增長率為14%。在全球化的名義下最大的變革是金融，是錢的遊戲，是所謂“產業金融化”。計算“產業金融化”高低，可以用金融產業佔GDP的比率，英美皆超過10%，日本則在5~6%，屬於金融產業弱國之列。非西方國家唯一的所謂發達國家，學西方還沒學到家，“製造業大國”普遍接受從“物的買賣”，而不是“錢的買賣”，“賭錢”非其所長。“物流”日本人利用漢字創造的概念，一到金融辭彙，比如“衍生工具”他們就只好用假名音譯了，日本有不少化學，物理，甚至文學“諾貝爾”，可就是還沒有經濟學“諾貝爾”。

在製造業領域，日本和美國經歷了長期的貿易摩擦，從服裝，家電到汽車製造。“間接金融”，即製造業廠家，依靠自己的“主力銀行”融資，在戰後日本重建和起飛過程中一直佔主導地位。與此相應，日本的“直接金融”，資本市場並不發達。日本人更喜歡儲蓄，而不是買賣股票和基金。方便到家門口的“郵政儲蓄”，為政府主導的“財政投融资”提供了成本低廉的豐富資金，造就了日本大企業品牌，從鋼鐵到汽車，無不如此。儘管現在的日本大企業，接受了美國的會計手法，普遍採取了“市價法”計算損益，企業和原來的“主力銀行”，企業或企業集團之間的“相互持股”，依然如故。股市，匯市動盪，製造業各家計算損益，比如日圓升值一元，豐田就是二百億日圓損失，本田90億，索尼20億。⁴美國風吹草動，市場動盪不安，企業界期待政府介入，安定市場。金融資本重視投機受益，日本企業重視長期的損益計算，而不是短期的股東收益，這與英美式“股東資本主義”差別鉅大。

1980年以後，日本對外投資猛增，主要是購買美國的房產和金融資產，一時間，美國人驚呼“日本威脅”，“日本購買美國”。1980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FDI）為196億美元，證券投資為214億美元，

⁴《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08年12月13日。

1985年，直接投資為440億美元，增長124.49%；證券投資為1457億美元，增了五倍多。1980年日本的海外淨資產只有115億美元，1985年為1298億美元，增了十倍。日本通過製造業和貿易賺了許多錢，賺到的錢大又投資到了海外，主要是美國的中長期國債。1981~1985年，日本經常收支順差為12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貿易順差來自美國，這些錢絕大部分購買了美國國債。1985年日本成為世界的最大債權國，也是美國的最大債主，這個地位到2008年才被中國所代替。“廣場協議”之後，隨著美元貶值，日本的美元資產大幅貶值，美元貶值達50%，日本的美元資產也就貶值50%，不少銀行大受損失。難怪日本人在反思這段歷史時期時，認為美元暴跌就是衝著日本積累起來的鉅額美元財富而來，衝著日本產業資本主義而來。

不論是股市，還是匯市，在美，日，歐三大區域，日本都是最小的，處於“邊緣國家”地位。股市總規模佔GDP之比，反映所謂“金融實力”。2007年紐約市價總額164950億美元，為美國GDP的125%，以NYSE計算則是155%。倫敦市價40230億美元，佔英國GDP的169%。澳洲的這個比率是175%，香港1015%。東京股市總價46790億美元，GDP比107%，與日本的GDP相當，在發達國家中最低。再看外匯市場，2007年，美元佔世界市場的43.2%，歐元佔18.5%，日圓只有8.3%。從各國市場的規模來看，美國市場佔了16.6%，英國佔34.1%，日本只有6.0%，也是最低。⁵ 反之，1970~1980年代日本家庭儲蓄率一直高達20%左右，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2006年，日本以現金，儲蓄，住宅等構成的國民資產高達20萬億美元，人均18萬美元，是美國的1.3倍，德法二倍，世界第一。2007年末，日本家庭擁有的金融總資產約為1544萬億日圓（約15萬億美元），日本家庭擁有的股票餘額為165萬億日圓，只有總資產的十分之一。

早在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的對日政策一個重要的轉變。美

⁵ 倉都康行：〈金融力如何測度〉，《金融vs國家》，築摩書房2008年，第31~35頁。

國知道，處理與日本的貿易摩擦和鉅額赤字絕非易事，比如有關汽車業的談判，要求日本給出“數字目標”，購買美國零部件之類，逼的日本政治家嚷出了“賣掉美國債券”的口號。美國意識到，從製造業本身與日本人打交道，永遠沒有結果，主戰場應該轉向金融。“全球化”旗號下的“金融自由化”，一把合適的殺手鐮，美國一次給予日本“第二次核打擊”，製造業大國陷入“核冬天”，一蹶不振。同時日本十萬億美元以上的儲蓄，無疑是一塊肥肉，極具魅力。通過“金融自由化”，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家大舉進軍日本，資本市場被英美以及一部分日本追隨者所支配，投機賭博新經濟，大行其道。和布什同時上臺的“小泉內閣，開始了“構造改革”，緩和或解除政府規制，和美國“接軌”，日本成了奇特的“轉型國家”。除了美國的金融高技術產業進入，大獲其利之外，留美的日本人也粉墨登場。2006年，因為股市欺詐被判刑二年六個月的崛江貴文是個代表人物。30出頭的此人突然出現日本財界，大筆斂錢。15~20萬投資者加盟，在短短的幾年中，以“活力門”（Livedoor）為中心的上市公司，其市價高達6880億日圓，號稱要超過豐田。崛江代表日本“新經濟”，崇尚美國式金融模式，說是“有錢可以買到一切”，包括當國會議員，結果是曇花一現。

所謂美國式“金融模式”，教科書的表述是由“新自由主義”金融理論設計，以金融自由化和緩和政府管制為前提，在資本市場以投資銀行為中心的金融模式，而且，利用最先端的金融技術，“金融工學”管理風險，通過利率，匯率的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房地產和金融債券的證券化，以及企業的收購兼併，追求利益最大化。日本金融模式，則是儲蓄—投資，商業銀行。在英美人士看來，日本模式幾乎不是“資本主義”，“共同價值觀”常常是外交語言。反之，日本產業界主流對於“金融自由化”，“金融工學”一直持懷疑態度，不改其“間接金融”的傳統體制。在國際金融市場，過去日本的銀行，諸如三菱，三井，住友，富士，日本興業銀行，長期信用銀行，還有

四大證券公司，屢戰屢敗，吃進的美國金融資產，最後還得吐出來。20世紀90年代危機之後，銀行界“重新組合”，都市銀行只剩下三家，15.3萬人的銀行職員，只剩8.5萬人。銀行界為了生存，採用了合同派遣勞動制度，減輕了企業負擔，也在傳統大企業“終身僱傭制”的僵硬體制中打出了一個缺口，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又增加了銀行收益。據日本銀行測算，1991年到2005年，僅僅低儲蓄利息一項，讓日本家庭損失了3300億美元，此外，還有高手續費，銀行收入的低稅率，總之是老百姓的犧牲，在十年之後讓日本的大銀行重新復活，這是金融危機之後“日本經驗”的重要內涵之一。最近，由於資本市場的混亂，發行公司債券和CP愈加困難，日本經濟界再次轉向，大有重新回歸依賴銀行，“間接金融”的傾向。⁶

次級貸款是美國的“金融模式”創新，泡沫的根源。層層包裝“證券化商品”風險，合理合法，符合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決定行為，何必監管？直到2007年8月，IMF審查美國經濟，警告說次貸可能危及經濟，日本人“十年怕井繩”，說美國的次貸風險，暗藏在金融高技術之中，一旦爆發，類似“核擴散”，連鎖反應，危及信用體系。事實上，日本的金融模式，儘管“接軌”不少，還是保存了“防火牆”，染上“次貸病毒”的金融機構相對有限，債權證券化規模不大，對金融系統影響有限。在某種意義上，金融體系抵制“小泉改革”，依然保持著“間接金融”的體制慣性，政府監管嚴格，金融機構的新商品開發、運營要受到政府嚴格審查。不過，隨著“次貸危機”影響實體經濟，美國經濟轉入停滯，真正大受打擊的還是製造業。日本依賴外需市場，主要是美國，歐洲市場，也依賴中國等新興市場。1990年代，日本大舉投資中國，東南亞，但是製成品從中國或東南亞繞路，最終市場還是美國。美國經濟感冒，日本發燒，美國金融危機，日本經濟更加衰退。老齡化，“少口化”（人口減少），

⁶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08年12月10日。

制約著日本內需的擴張，一旦外需市場萎縮，龐大的日本製造業頓入停滯，由此看來，日本經濟依然綁在美國的戰車上，脫鉤很難。

2008年8月10日，華盛頓召開G7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中川昭一財政金融大臣，談起當年的“日本經驗”，批評美國政府的“放任主義”、質問“次貸危機發生一年之久，為何沒有採取緊急應對措施？”十年多前，克林頓政府高官頻繁訪日，面授機宜，要求日本政府重拳應對金融危機。1997年11月美國魯賓財長訪日，指示日本說，“為解決金融不安，必須馬上投入公共資金”。根據美國的指示和壓力，日本於1998年3月拿出1.3萬億日圓向銀行注資，小淵內閣召集“金融國會”，制定《金融健全法》，再次動用7.5萬億日圓，將日本長期信用銀行，債券信用銀行“國有化”。美國批評日本的危機對應，不是太少，就是太慢（too late, too little），魯賓和薩莫斯一度成了日本金融危機的“教主”。1999年，新任財長薩莫斯寫信給日本“金融再生委員會”委員長柳澤伯夫，催促日本更大規模地投入公共資金，解決不良債權問題。美國對日本已到“干涉內政”的程度，所以日本人要問，為什麼美國自己的次貸危機發生一年之久卻遲遲無所作為？

也許布什總統G20講話，道出了美國“教主”的複雜。冷戰解體之後，美國不斷傳教，是市場主義原教旨的老師，因此，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是經濟危機，還是對美國式自由市場主義的信任危機，特別是亞洲。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發生危機的國家，不論是馬來西亞，印尼，還是韓國，經濟結構類似日本，加工製造，出口導向。1997年，由於美國式自由市場主義的教導，泰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當天泰銖兌美元暴跌17%。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被害，印尼也受“傳染”，深受打擊。此後，金融投機家又移師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開始，香港恆生指跌破九千點大關。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韓圓匯率跌至1737.60韓圓兌1美元，一批企業破產，難以償債，只好向IMF

求援。IMF 開出的藥方，多是猛藥，金融自由化重創亞洲經濟，也使日本陷入困境，日圓的大幅貶值，給中國經濟帶來鉅大影響。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動用外匯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被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 7.75 港元兌 1 美元，讓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危機波及俄羅斯，股市匯市下跌，引發金融危機，政治動盪，並引起歐美國家股市匯市劇烈波動。亞洲金融危機最初是區域性的，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危機超出了區域性範圍，“全球化”了。

人們至今還在討論亞洲金融危機真相，其實“美國教主”的自我矛盾已經給出了答案。根據英美主流學者的“教科書”，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完善和可靠的制度，美國式自由市場主義主導世界，到處“傳道”。亞洲危機之後，美國將責任推到“亞洲國家的體制弱點”，推給“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以及法制不健全、金融監管不健全。美國除了贊同 IMF 對泰國的 170 億美元救援，此外就沒有什麼救援措施，符合美國式自由市場主義。格林斯潘還教導說，亞洲應該知道“西方特別是美國運行的資本市場是一種優越的模式”，所以，美國開出的藥方總是停止政府援助、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馬哈蒂爾說過：“我還記得，他們當年如何告訴我們，永不要為瀕臨倒閉的企業包底”。IMF 答應拿出二百億美元救援，條件是要求韓國經營破綻的銀行和企業倒閉。日本在亞洲貿易投資鉅大，為穩定亞洲的股市匯市，當時日本曾提出過“亞洲貨幣基金”（AMF）的設想，因為美國不點頭，中國也沒有表示支持，付之流水而已。

金融危機“日本經驗”到底是什麼？歸根到底還是“服從”二字。日本的體制和政策，符合美國的戰略思維，就允許和支持，甚至命令日本強制執行。反之，日本和亞洲，特別是東南亞經濟關係密切，只要美國不允許，日本依然無所作為。日本在製造業市場對美國的依賴，在金融領域對美元霸權的“服從”，決定了日本還是“無責任國家”。這次美國的金融危機，再次給日本上了一課。學者們說，這次

危機使“盎格魯 — 撒克遜經濟”要進入“核冬天”，可能走上日本十年衰退的老路，依賴美國的日本如何走出困境？全球需求，美國市場佔到 30% 以上，日本和亞洲，只要依賴美國，服從“美元霸權”，注定難以“獨善其身”。這個歷史經驗告訴人們，只要不願意永遠受制於人，中國和亞洲必須反思過去，找到自己的道路。

三、亞洲的“文化革命”： 超越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

亞洲作為一個地區概念，起源於歐洲人的對立觀念，即歐洲對歐洲以外的東方世界觀。中國，印度，伊斯蘭，東南亞各國，歷史文化各不相同，但都有過漫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史，只有日本“脫亞入歐”，仿效列強，侵伐霸道。英美講究自由，講究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結果不平等。金融高管，企業高層的過分高收入，成了這次金融危機的話題之一，雷曼 CEO 福爾德 2000~2007 年工資，獎金，期權收入 4.85 億美元，2007 年高盛 CEO 得 6800 萬美元獎金。當選總統奧巴馬，批評美國企業家，金融高管“奢侈”，讓他們學習日本經營者。日本所代表的東亞資本主義，講究團體主義，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全民一體加入社會保障，貧富差距遠小於美國，更沒有美國企業高管的那種高收入。在政治體制上，日本從“君主立憲”到“權威主義”，一直沒有改變國家主導資本主義的基本路線。戰後，美國最終決定保持日本的“天皇制”，超越了美國人的價值觀，因為“皇權”和“服從”與英美的“自由民主”距離遙遠。

關於“東亞模式”在學術上爭論了近 30 年，在筆者看來，這個模式不是英美模式的“過渡模式”，而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獨立性，普世性，一種另外的市場經濟體制，至少沒有經過西方資本原始積累，

殖民掠奪。市場經濟和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日本和東亞的資本主義，都只是個別的，特殊的東西。黑格爾所謂“普遍寓於特殊之中，任何特殊都不能窮盡普遍的意義”。面對全球化，華盛頓共識的“普世價值”，亞洲實際上已經在探索“另一個世界”。撒切爾絕對主義思維，說“沒有其他選擇”（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和“歷史終結論”一脈相承。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垮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好像證明了她是對的。實際上，替代方案多種多樣，“後發國家”走向富裕，實現公平，可以有各種路線選擇。不論“中國式”社會主義，中國式市場經濟，都是可能的選擇，實踐證明，所謂“邏輯矛盾”的“中國式”，與“日本模式”，“東亞模式”一樣，超越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的嘗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反之，亞洲全面接納華盛頓共識，就可以和美國主流WPAS（白人，新教，盎格魯——撒克遜）一體化？問題倒是亞洲自己的創造，如果佔世界經濟三分之一的亞洲，搞成“另外一個世界”，反而有可能建立“和諧”，在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陷入危機時，亞洲的選擇和創新可能重造“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普世價值。

戰後到 1970 年代末，工業化國家有過“黃金 30 年”，美國承擔了世界經濟“發動機”的角色，日本，亞洲地區不可避免地依賴這個“發動機”。1980~1990 年代，亞洲內部，特別是東亞地區，已經形成了製造業，貿易和投資的“連鎖轉換”，“雁形發展方式”，日本曾經當過那個頭，臺灣，韓國跟進，爾後中國也加入其中。但是，不論是日本，“四小龍”，還是 ASEAN 和中國，“最終消費者”還是美國。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在產業結構上，既有互補，也有競爭。設備投資過剩開始在亞洲出現，服裝，電視，半導體，石油化工，鋼鐵，造船，電子產品，一直到玩具，制鞋，各個領域都存在產能過剩。西方各國，在冷戰解體之後，為爭奪新興市場，在資本密集型產業，比如石油，化工，飛機製造，曾有一輪擴大投資的過程，動因之一是亞洲的新興市場。市場機制下的投資

決策，往往不是“合理預期”，而是某種“集團行動心理”，常常引發共同的“投資熱”，造成大約十年一次的設備投資增減循環。1990年代中後期，大規模製造業“投資熱”之後，發生美國“虛擬經濟”危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這種週期性，美國已經沒有多少製造業。長期以來，美國市場支撐亞洲的製造業出口，美國“發動機故障”，立刻就是“硬著陸”。2008年9月以後，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鋼鐵，化工，電器電子等各個領域，都出現了相對產能過剩，廠家紛紛降低開工率，原材料市場暴跌，加工企業大量倒閉。

在對美依賴的同時，亞洲特別是東亞 10+3 的區域內的相互依存，也有了鉅大的進展。1980年這個區域內的進出口，佔其整個貿易額的比率 30% 左右，到 2003 年這個數字接近 60%，雖然低於歐盟的水平，決不亞於“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中國對外出口的 40% 左右也在區域內。⁷ 問題在於金融體系，在這個鉅大的製造和貿易經濟圈中，交易依然以美元結算，貿易黑字，回流為美國的國債，支持著“美元霸權”，這種國際關係又制約著亞洲自身的發展。中國 30 年的改革開放，重複了日本和東亞“四小龍”走過的道路，在許多領域中國的戰略產業還在發展之中，相對弱小，而“世界工廠”有些還停留在加工廠的水平。危機發生之後，沿海城市的加工廠經濟遭受到空前的重創，一度繁榮的中小製造業城市，比如東莞，溫州，晉江，一部分繁榮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比如塑料，制鞋，玩具，沒了外單，陷入困境，造成大批農民工回流農村。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美國的金融危機，如此影響中國實體經濟，暴露了中國經濟成長方式的嚴重問題。地區內的貿易佔了如此之高的比率，如此隨波逐流，極不正常。亞洲的兩難選擇在於，一是繼續依賴美國，維護“美元霸權”，今後還得跟著華爾街沉浮，一是走向

⁷ 黃曉京：〈全球化與東亞地域經濟〉，《香港傳真》No. 2003~36；加納AYUMI：〈東亞共同體構想〉，《The world compass》，2005年4月。

“另一個世界”，逐漸擺脫美國的制約。目標並非閉關鎖國，也不可能排斥歐盟，美國，而是建立和歐盟，美國對等的亞洲經濟體。當然，這個選擇絕非易事，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決非只是幻想。

除了貿易和直接投資，亞洲已經在摸索獨自的金融合作，這不是來自“理念”，或“亞洲價值”，而是來自經濟自身的發展需要，類似於中國農民的“包產到戶”。早在1997年，日本提出過“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 Asian Monetary Fund）的構想，建議籌資一千億美元，日本出五百億美元，給受國際投機基金攻擊的會員國提供資金援助。1998年，日本再次提出“新宮澤構想”，主張建立亞洲基金，作為規避匯率風險的制度安排，日本曾經是亞洲金融合作的主要推手。十年之後，美國金融危機逼著亞洲“舊事重提”，主角不再只是日本，而是中國，日本，韓國和東盟十國共同組成的10+3集團。中國外匯儲備有二萬億美元，代替日本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持有6259億美元國債，其他亞洲國家，行為方式相似，積累了鉅額外匯儲備，相當一部分投資美國國債。在國際金融領域，亞洲10+3集團已經具有相當實力，建立地區性金融機制，逐步制約“美元霸權”。有學者認為，1998年，“日本實際上是在一個錯誤的時機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建議”。⁸ 亞洲國家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釘住美元”，亞洲貨幣不能從根本上和美國“脫鉤”，但它可以抑制國際金融界的投機風險。美聯儲前理事梅耶，在其回憶錄《聯儲歲月》中寫道，當年美國之所以反對日本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構想，是因為對金融危機本質的不同理解。美國認為亞洲的金融危機，起源於亞洲各國的經濟結構，落後的金融市場，要求亞洲進一步“轉軌”，學習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而日本和亞洲，如馬哈蒂爾這類的代表人物，則認為國際投資者的投機行為，造成了亞洲的金融危機。

⁸ 張衛華：〈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何時誕生〉，《經濟》雜誌報道文章，2007年9月8日（<http://mag.chinayes.com/MagazineBase/M23/627/20080626115219165.shtml>）。

2000年亞洲10+3集團，在泰國的清邁終於邁出了第一步。區域貨幣互換協議，即《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界定了東盟貨幣互換協議（ASA）的規模，以及中日韓與東盟之間的雙邊互換協議。以後，亞洲10+3集團，簽訂了許多雙邊協議，累積金額超過八百億美元。2008年底，中日韓首腦的福岡會談，繼續著這一協議的思路。地區性雙邊互換協定，目前資金規模不大，比如中日之間只有30億美元，日本和ASEAN有1265億美元，日本和印度30億美元，日本和美國則是無上限的美元~日圓互換。⁹但是，如果雙邊貨幣互換能夠進一步擴展，形成多國間互換安排，實際上就是亞洲貨幣基金的雛形。10+3國家集團的金融合作，如果實現機構化，制度化，建立常設的政策對話和監控機構，不但可以平衡短期的市場波動，還將為這個經濟圈的實體化提供基礎。IMF是按照美國意圖行事的，AMF則是亞洲地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在方向上中國應當支持這個“內生”機制的成長。

亞洲的未來更取決於“內生的發展”。戰後日本給美國當“老二”，靠美國支援復興經濟，高速增長，成為當時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不過，日本在依賴美國的同時，在制度建設上另搞一套，日本式經營，終身僱傭，年功序列工資，企業工會，以及“富不過三代”的遺產繼承稅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式的制度建設，目標恰恰在於抑制“過度市場化”，過度競爭，其結果是一個“一億人總中產”的相對平等的社會體系。傳統的集團主義，避免了美國式的貧富差別，優勝劣敗，激發日本人“內生的”發展動力。同時，隨著“國民所入倍增計劃”，“養老金計劃”之類國家主導的社會政策，增大了日本的社會安全網絡。與日本不同，亞洲各國由於歷史，文化和殖民地統治，經濟二元化，都市和農村，都市社會內部的貧富差別十分嚴重，繼續現有的發展模式，無法改變這種格局，也就

⁹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08年12月11日。

難以持續發展。亞洲人口佔世界人口的 60%，地球上每天 36.5 萬人出生，57% 是亞洲人，印度 11 億人口，中國 13 億，就佔了世界的 37%。如此鉅大的人口資源，使亞洲成為全球勞動力供給基地，加工外包的首選，同時亞洲又是最有希望的市場。中國 30 年改革，市場化改革，引入外資，“兩頭在外”，特定的歷史時期，起到了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無可非議。問題在於，市場主義導致中國“核心價值”共同富裕的喪失，“富可敵國，貧者無立錐之地”。改革 30 年之後，中國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面臨一個新的戰略轉變，而美國的經濟危機，使這個轉變顯得更加急迫。1990 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成長，正在成為另外一個世界經濟成長的“發動機”，恢復了布羅代爾所謂“中國經濟世界”的國際地位，發展中的制度建設將給亞洲帶來深遠的影響。

市場體制是一把雙刃的寶劍，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使另一部分人富不起來，美國式自由市場主義尤其如此。平衡市場主義的負面效果，在相當程度上解決社會公平，將決定中國和亞洲國家的未來。十年經濟衰退，許多人擔心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其實由於藏富於民的政策，在效率和公平上的中庸協調，日本社會總體安泰，沒有大的社會動盪。解決社會公平，這不單是一個道德選擇，也是一個理性選擇。1980 年代，中國的改革近於“日本模式”，強調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黃金時代。冷戰之後，美國一家獨大，與美國全面“接軌”似乎成了唯一，不加選擇的接收，給中國社會各個方面帶來困惑，城鄉兩級化，教育，醫療，住房三大問題。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一個農村人口還有八億的窮國，如何利用國家的力量，平衡市場競爭，增進社會公平，可能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課題。由於亞洲各國情況相似，使這個課題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義。近代以來，曾經在農業，商業，文化等各個領域創造了輝煌的亞洲，被殖民主義所打破，隨之而來是西方文化的滲透，儒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印度文化，毫無

例外地受優勝劣敗的價值衝擊。近代化同時就是“文化失調”，“停滯的亞洲”和“近代的歐洲”成為一種對立圖式，一種固定觀念，剝奪了亞洲固有文化的“話語權”。隨著亞洲的復興，除了經濟之外，文化反思也隨之而來。遠在西方人“發現”新大陸，傳播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之前，亞洲早就存在著複雜的商品經濟，市場交易，中國製錢廣泛流通，10+3 集團，亞洲貨幣基金，亞洲經濟共同體，亞洲貨幣，只不過是現代制度，形式的“文化復興”，對於美國和西方，則可能是一場“文化革命”。

最近，“歷史終結論”者福山有個談話，他說，他“至今仍然信奉新保守主義理想，這種思想來自頻頻受挫的左派。左派過去認為民主和正義不僅是美國的原則，而且適用於整個世界，而美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有義務在全世界維護這些原則”。關於布什發動的戰爭，他說，“我並沒有反對。但很快我就覺得戰爭準備得不夠，對困難估計得不足，而且美國還在行使權力時採取一種‘列寧主義’方式。然而，在單極世界中，這種方式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首先要求其他國家必須相信美國的善意，而戰爭的爆發沒有證明美國的善意”。所謂“列寧主義方式”，是指主張用戰爭“輸出”美國“普世價值”。福山自稱是“新保守主義的馬克思”，他說“作為馬克思，我相信長期的演變。1989 年針對柏林牆拆除所形成的局面，我建議採用‘歷史的終結’的概念。這個概念來自於黑格爾，首先被馬克思繼承。我當時寫道，伴隨著共產主義的垮臺，只剩下唯一的政治選擇，就是資產階級民主。但完成資產階級民主是一個長期的、緩慢的、艱難的事情。可‘列寧主義者’想加速推進這一進程，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後，想利用力量對比關係在中東推行民主化，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

雖然如此堅持“歷史的終結”，福山畢竟是學者，還是意識到了對立面的存在。他說“我從沒說過美國是民主終結的典範。

歐洲代表著這種歷史終結的可能性。歐洲通過努力超越民族國家，比美國更加接近一種真實的歷史的終結。美國則繼續以自己的軍事實力為榮，小心翼翼地維護自己的主權。中東有些人想建立一種伊斯蘭民主。他們認可民主的想法，但把民主與自由割裂開來。這的確也是一種做法，但我認為它走不遠。在歐洲、拉美和非洲，沒有人想採納這種模式，就連穆斯林世界也沒人願意。這是針對伊斯蘭教面對現代化所遭遇的失敗而想到的應對辦法，不是一種真正的解決辦法。中國是一個更難對付的對手，因為它懂得與現代化妥協，讓現代化為己所用，懂得提高競爭力，懂得成長壯大利用科學技術，同時又維持專制政權的統治”。姑且不論福山是否是“新保守主義的馬克思”，關於中國，他的感覺倒是敏銳的。不過，他的結論是武斷的，這種武斷，恰好來自於作為日裔美國人對亞洲的無知和短視。歷史剛剛開始，從中國和亞洲的復興，從亞洲的“文化革命”開始。

美國的金融危機，標誌著中國與美國“接軌”改革的終結。保爾森最近警告說，“美國金融危機不能成為中國減緩金融改革的藉口，我們已經轉告美國下屆政府，一定要抓緊推動中國改革”。是的，中國必須建設新的金融體系，但不是繼續和美國式金融模式完成“接軌”，繼續追隨 IMF 和世界銀行。擺脫美元霸權，IMF 束縛，需要一個團結的亞洲，共同維護本地區的共同利益，必要時在金融合作上另起爐灶，和歐盟一樣，亞洲的一體化將改變世界的格局，進入真正的“民主主義”時代，類似於毛澤東領導的“邊區蘇維埃”，對抗美國的“一家獨大”。隨著美國地位相對的下降，精明的日本早就謀劃，並在美國之外的亞洲開闢“第二戰場”，實施“對美依存”到“親美入亞”的戰略轉變。日本普遍認為中國遲早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的“超一流大國”，為此“經營資源”必須向亞洲，中國轉移，讓日本“回歸亞洲”。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界最積極，不少日本大企業已經

將經營重心轉移亞洲，建立以新加坡為中心，兼顧亞洲東西，中國和印度“兩個戰場”的經營體制。因為除了中國，新興經濟體還有所謂“金磚四國”（BRICs，俄國，中國，印度，巴西），“金磚六國”（BRIICS，加上了印度尼西亞和南非），還有 VISTA，又加上了越南，土耳其，阿根廷。不管是“金磚”還是“VISTA 信用卡”，“人類有史以來高速增長同時化”的主力是亞洲。歷經 20 餘年，歐洲終於實現了歐盟聯合，有了歐元區，統一貨幣，區域內貿易歐元決算，其經濟和政治意義顯而易見。隨著亞洲經濟的成長和一體化，貨幣聯盟將是一個必然結果，問題在於如何推進走向“亞元”。人們懷疑，亞洲的“西方國家”日本，是否會真正“回歸亞洲”？正像英國“光榮孤立”，“親美疏歐”一樣，日本是美國的盟國，美日同盟，所以“親美入亞”也有中庸調和的一面，眉目不清。在東亞峰會上，日本政府參加“吉隆坡宣言”，宣稱把建設“東亞共同體”作為戰略目標。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體，實力遠大於英國，日本經濟日益依賴中國和亞洲，只要中國參與和支持，日本將無法選擇“光榮孤立”。

日本人將自己的“回歸亞洲”也稱為“文化革命”。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數典忘祖，搞過一場“脫亞入歐”的“文化革命”。雖然“脫亞入歐”路線成敗尚無定論，最少它使日本成了亞洲的“西方國家”，進入了“富人俱樂部”。中國和亞洲的復興，使敏感的日本看到其國家利益的所在，“親美入亞”不是戲言。美國一向非常關心中日關係，最近國家情報委員會又出了《2025 年世界局勢預測報告》，對中日關係的未來的幾種可能性作了評估。中日關係既有可能保持互利，也有可能反目成仇，中國持續經濟增長，對日本的重要性將繼續增強。中國強軍，使日本繼續保持美日軍事同盟，也可能聯合亞洲其他國家，建立包括多國的安全保障框架。反之，中國經濟出現衰退，或者稱霸亞洲，日本可能聯合其他所謂“民主主義國家”，強化自己的軍事力量，與美國

一起孤立中國，亞洲將面對“中國”還是“日本”的困難選擇。如果美國在東亞的存在感降低，日本可能更加接近中國，中國將承擔更重要的角色。即使美日同盟弱化，由於國內抵抗勢力強大，日本擁有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中國對日本構成明顯威脅時不排除日本建造核武器。如果中美兩國更加接近，美國容忍中國的軍事力量，並減少在中國周邊地區的軍事存在，日本也將更加接近中國，韓國、臺灣、東盟各國和地區也將會順應潮流。不管願意與否，美國的戰略家們終於承認，一切取決於中國。

四、簡短的結論

通過日本對美國金融危機的“既視感”，與日本金融危機的比較，可以說金融危機的本質，不是監管不力，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失敗，而是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美國由此將盛極而衰，必須改革。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日本開始了“親美入亞”戰略轉變，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追隨”和服從，使其無力擺脫美國“金融霸權”的束縛。中國和亞洲的復興，為日本的亞洲回歸創造了條件，能否建立和美國“脫鉤”的亞洲經濟共同體，金融合作體系，以致於“亞元經濟區”，將取決於中國的持續發展和亞洲政策。同時，日本模式的“好資本主義”側面，值得借鑒，創造中國“內生發展”機制，以國家主導推進社會公平的制度建設，超越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只要中國經濟社會的實現可持續發展，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經濟共同體”就不只是一個幻想。